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中国学者论文集

中国史学会编

中 华 书 局

编辑 张联芳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中国学者论文集
中国史学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4³/4印张·1插页·300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7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352 定价: 4.60元



1984年7月中国史学会主席团部分成员、中国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代表团部分代表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埃列娜·阿维勒夫人在北京合影

序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定于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举行。这是国际史学界每五年一度的盛会。世界各地将有数千名历史学者参加，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中国史学会第一次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集体会员，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大会。收录在这里的论文，是代表团的成员为同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撰写的。

大会的学术讨论分为三大部分：重大课题、方法论和编年史。1985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因此，“反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历史学者们对于这个课题给以高度的重视，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产生于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第一次大战过去不过二十来年，帝国主义的矛盾就再次爆发为更大规模的、使生产力遭到无情破坏的战争，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合，资本主义这种陈旧生产方式越来越阻碍和违背社会历史发展、人类生存的利益了。但是，这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力量空前增长起来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了反抗纳粹德国的入侵，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了反法西斯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违反帝国主义的愿望，成了世界民主力量、革命人民的伟大胜利。亿万人民群众经过自己的顽强奋战，英勇牺牲，终于写出了人类历史上又一辉煌伟大的篇章。大战结束以后，历史继续沿着人民力量决定事变的轨道行进。东方和西方一系列国家脱离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再也不是象第一次大战以后只在俄国被突破，而是在广大的土地上瓦解了。其中六亿人口的中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人们很容易看出它的世界性意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不断高涨，以前的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现在加入联合国的一百多个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独立的占很大一部分。光非洲就出现了三十几个独立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次大战，相隔只有二十来年。第二次大战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局部战争此起彼落，新的大战毕竟没有爆发。归根到底，这是由于广大群众觉醒，人民民主力量强大了。目前战争威胁继续存在，超级大国那些最现代化的武器，决不是为了放焰火而制造出来的。人们对此不能不怀着高度的警惕。但是，如果世界性战争瓦解资本主义、造成民族独立和整个历史的发展是过去已经表现出的一条客观规律，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未来也将循着它的规律前进。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总结它的经验，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各方面人士、也是历史研究者无可旁贷的职责。第十六届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列为一个重大课题,表现了组织这次大会的历史家们的远见。

至于讲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长期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力量和意志的总汇集,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高潮。它标志出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了。爱国主义是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时代不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它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厚感情、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宝贵的,应当发扬光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为什么中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取得胜利,一部抗日战争的历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充分、完整的回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是全民族爱国力量共同斗争、共同努力取得的。这些爱国力量包括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一切关怀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研究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他们有共同的过去,也应当有共同的未来。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的重要性。就象以前日本报纸上说过的:“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的历史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世代代在睦邻友好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是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中国,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世界历史学讲坛上今年所突出的这个重大课题,当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国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论著中,有不把抗日战争前期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里面的。理由之一,是那时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其实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特点,它在世界各地并不是从同一个时间开始的。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至1939年意大利、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新侵略战争,都是被侵略国家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始。现在人们通常把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从欧洲来看,那里从此爆发了全面战争。这合乎事实。但是那也不足以准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因为它不但排除了在那以前中国、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人民的巨大斗争,也没有把苏联、美国这两个大国包括进去。谁都知道,苏联、美国参战,都是在那以后几年的事。中国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起,展开了连续八年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惊天动地,伟业空前。没有中国的抗战,就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东方的胜利。战争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有过“先欧后亚”论或“先亚后欧”论的讨论。不论哪一种主张,都没有认为亚洲、中国的斗争可以忽视。所以,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充分估计到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取的。我们这本论文集里,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根据事实,部分地对这个问题有所说明。

文集共收论文十二篇。三篇讲抗日战争,七篇讲其他一些专题。它们是各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只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再有两篇是评述最近五年来我国历史研究的成绩的。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动手较晚。文章又要赶在开会以前印

出。错误疏漏在所不免,其中我自己写的东西首先如此,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中国史学会头一次作为团体会员派代表出席世界历史科学大会,这些论文的起点可能不高。但是应当想到,椎轮不过是大辂之始,往后必定一次胜过一次。有个东西作比较,那时回头来看,就知道前进了多远。再有,促进学术繁荣有各种途径。利用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举办的活动,来推进国内研究工作,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出版《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也是由于我们有这些想法,抱着这样的希望。

刘大年

1985年1月25日

目 录

序·····	刘大年 (1)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刘大年 (1)
商人与佛教·····	季羨林 (91)
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	
——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	
发展关系的考察·····	林甘泉 (208)
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	高望之 (231)
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	
——兼论山脉、沙漠、绿洲	
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广达 (253)
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	
的中国古代长城·····	金应熙 (271)
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	余绳武 刘存宽 (292)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齐世荣 (317)
关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	华庆昭 (354)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	莫 阳 蔡祖铭 鲍世修 (376)

近五年(1980—1984)中国历史学

概述.....李 侃 田居俭 (398)

1980—1984 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

基本情况.....朱庭光 陈之骅 (424)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

刘大年

—

爱因斯坦在某处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我们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并不需要什么“创造性的想象力”。但要科学地认识历史，它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切实回答的问题。这需要充分研究，并不能靠重复某些人所共知的原理去得到解决。

今来古往的历史家，所发表的议论，所写的书浩如烟海。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来专门论述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每个研究者、著述家，都有一个事先挑选的对象摆在自己的面前。不然的话，他们那些滔滔不绝的议论便无从发起。以往各种历史著作学术水平的高低、科学成分的多寡，一般地和撰述者选定的对象及其相关的解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历史家们的看法，竟然差别那样之大，以至难于找到共同的地方。那些彼此矛盾的看法，可以基本上分为三种或三类。第一种，历史研究不存在

一定的客观对象;第二种,凡过去的一切事物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种,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对于所有这些主张究竟应当怎么看待?是否只要从中选择一种,或者对所有各种主张兼收并蓄,取长去短,就可以把历史研究对象的问题解决了呢?

第一种,即历史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相对主义者、“当代”主义或现在主义者就是这样看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宣传这种看法,最集中,也表现得最有理论。克罗齐反复说:“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时间的历史,我们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回声,“也就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心灵中回荡,……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代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既然所有历史只是“历史家心灵中回荡”的产物,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而编造出来的,现在性或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特征”,毫无疑问,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客观的一定的研究对象了。因此,克罗齐继续论证:历史研究中必须毫不心痛地抛弃那种一般历史或“普遍史”的想法。“‘普遍史’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或事实,而是一种‘主张’是一种起

因于编年体及其‘物自体’的一种主张，是起因于一个奇怪的建议的主张”。历史变成“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或事实”了，而只是因时、因人不同的“主张”“建议”了，提出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问题，当然再也没有意义。那末，这种与历史事实、活动无关的“主张”、“建议”又从何处产生出来？克罗齐明确回答说，“精神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1]。克罗齐以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称。他的这些议论，非常明显：根本拒绝承认历史学有不以“历史家心灵中回荡”为转移的客观对象，是一味从事以“当代”主义或现在主义为牌号的历史唯心主义说教的。相对主义、现在主义的其他一些主张者，或者用一种对科学缺乏严肃态度的口吻说，历史嘛，不过是一只猫而已，它让人抓住尾巴扔到了它很不想去的地方。不同观点的人完全可以用相同的材料写出相反的著作。或者说“历史事实是以形象的形式存在于某某人的意识里，因此，它是现代的，是现在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随着某人现在的意识变化的^[2]。他们完全凭主观对待历史事物，没有给研究问题提供任何合理的因素。照这主张，就是说，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并不存在，你讨论什么？

第二种，凡属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过去的一切事物都是历史事物，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历史唯心主义也这样认为。人们的历史观点五光十色，却没有一个人试图否认这个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凡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切”之中，万事万物，无所不有。“一切”都成为研究对象了，实际就取消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了。

主张凡过去的一切都是对象的研究者，可以举出马克思主义著作上的话作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后来恩格斯把“唯一的科学”改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3]，也仍然指出历史科学的范围是至大至广，无所不包的。这不正是说，一切过去的事物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吗？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也没有说，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与历史学是同一门科学，也从来没有说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等，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是分门别类论述的。历史学的地位，在那些论述中甚至提也没有提到。恩格斯、列宁还分别论述过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科学一股脑儿归到历史学里面去，没有认为这些科学研究的对象，统统应当看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对于“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是在解释“一切历史科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讲的。“一切”，当然就不止一门一科，里面有各种内容。在《反杜林论》上，恩格斯分析人类认识领域的“三大部分”时，更作过明确的说明。他说：“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的真理情况还更糟。”“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

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4]。”何谓“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个说明足以消除一切误解。“第三类科学”、“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范围太宽广了。正象第一类数理科学、第二类生物科学那样,它们各自包括许多不同的科学,许多不同的研究对象。没有人会认为第一类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是同一个研究对象,第二类科学中的细菌、植物、飞禽走兽等也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借用动物或植物分类学的名词来说,历史学不过是历史“类”里面的一“种”、一“属”。历史学研究对象问题所要解决的,不是这个“类”研究什么,而是这个“类”里面历史学“种”或“属”研究什么。它们的界线一目了然。所以,凡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研究对象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种,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同第一、第二种相比,这要算做一大类。它们立说角度各不相同,需要一一分别叙述。

人、“人事”对象说。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离开了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历史。把人、“人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中国、外国一些古典历史名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持有这种见解。司马迁引前人的话说:《春秋》的特点,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司马迁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史记》上把叙述人物的社会政治活

动作为中心。梁启超评论《史记》说：“其最异前代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类普鲁塔克之英雄传”^[5]。塔西陀的《编年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等，莫不以人的政治活动为叙述重点。《罗马史》和《传记集》中，大量辩论、应对的段落，与《左传》风格相近。它们都注意突出人物及其社会、政治活动。《罗马史》上夹杂不少宗教神话故事，说“罗马城中没有一块地方不充满着宗教的关系，没有一块地方没有一位神明主持”，基本内容仍是讲的人，不是讲的神。《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认为历史的“主要题材是战争和政治”，也同样是主张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事。马克思说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6]。那些古典历史名著，能够流传至今，除了一些偶然性之外，它本身包含着不可缺少的合理因素，是重要的条件。

记述、论列人和人事，当然不是古典著作独有的特点。绝大多数的历史书都是这样编写出来的。但是仅仅叙述人、“人事”，一点也不能说明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7]。谁也没有认为离开了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种种活动，还存在历史的发展。问题在于个人的活动以什么为先决条件，受什么支配？一些个人追求这样的目的，又一些个人追求相反的目的；一些个人设置障碍，又一些个人千方百计突破那些障碍；这些个人结成这样的集团，那些个人又结成那样的集团；个人、集团追求自己的目的，又总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设想实现那些目的。一部文明史，全部是在这些个人、个人集团的尖锐冲突、斗争中走过来的。各